

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

明清卷·事件

甲申之

王兴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知识丛书

明清卷·事件

甲申之变

王兴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申之变/王兴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04 - 9422 - 5

I. ①甲… II. ①王…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明清时代 IV. ①K24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375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46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一 甲申之变前大动荡的政局 (1)
 - (一) 明王朝内外交困, 危在旦夕 (1)
 - (二) 大顺据有中原, 建国西安 (15)
 - (三) 大清据有东北, 伺机入关 (41)
- 二 大顺军东进山西直逼北京 (63)
 - (一) 北京进军战略决策部署与实施 (63)
 - (二) 李自成亲征与永昌诏书 (67)
 - (三) 北克宁武, 夺取大同、宣府 (79)
- 三 崇祯帝拯救计划的破产 (89)
 - (一) 李建泰代帝出师的闹剧 (89)
 - (二) 调吴三桂勤王计划受阻 (97)
 - (三) 南迁之议的流产 (103)
 - (四) 增兵筹饷的苦果 (114)

四	决定明朝命运的北京决战	(131)
	(一) 大顺军包围北京	(131)
	(二) 北京的城防设施与明朝 坐以待毙的部署	(139)
	(三) 李自成的战和策略与北京和谈	(150)
	(四) 三大营不战而溃，大顺军入据北京	(158)
	(五) 崇祯帝自缢煤山	(170)
	(六) 明朝败亡的原因分析	(177)

五	吴三桂降清与大顺军战败山海关	(184)
---	----------------------	-------

六	清军长驱入关与迁都北京	(213)
---	-------------------	-------

七	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	(223)
---	-------------------	-------

一 甲申之变前大动荡的政局

公元 1644 年的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这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以朱由检为首的明王朝、以爱新觉罗·福临为首的清王朝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三大政权，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大清王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可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

（一）明王朝内外交困，危在旦夕

由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经过 200 多年的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科学技术仍保持着世界前列的优势。然而在长期统治过程中，

政权日趋腐败，文恬武嬉，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情况却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社会经济依然处于上升的趋势，各项改革在卓有成效地推进，政治改革举措相继出台，大力推行职官责任制，建立严格考核制度，严明赏罚，官吏依据政绩升迁；赋役改革也全面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清丈，按照一条鞭法征收赋役；任用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消除水患；加强边防，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防御蒙古，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防御女真。时至万历十年（1582年），明王朝已完全摆脱了自英宗以来的衰势，“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有材料记载说国库的粮食充盈，足可以支用10年。援朝御倭战争胜利展示的强大国力，为世人瞩目。另一方面则是神宗的贪婪也在此时凸现出来。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概括。说他患下“酒、色、财、气”四病，“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因此，特意献上四句箴言，希望圣上自行根治。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后经阁臣们的极力营救，才免遭一死，被削职为民。

治国理民是国君的基本职责。而明神宗对于政事的厌烦令人吃惊。临朝听政是朝廷理政的基本方式。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发生日食，他下令停止朝贺。这是特殊情况。没想到，此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他在位48年，竟有20多年不与臣下共商国

事。他不临朝听政，不见大臣，不批答臣下奏章，致使御前奏章，堆积如山，衙署之封章，如沉大海。更为荒唐的是，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机构的内阁、六部机构在内，长期缺员不补。这样就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行。和先前历代帝王相比，神宗对金银财宝的酷好和追求，却是无有止境。这固然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市场上日益增多的商品与财富，刺激着整个社会消费，高消费成为社会上层的追求，自然也刺激着他的奢侈的欲望，再加上他贪财好货成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因而，挥金如土，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用去白银 934 万两，袍服用费另拨 270 万两。仅一次采办珠宝，就耗去银子 2400 万两。不仅如此，他从 18 岁起，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定陵），规模宏大，用料讲究，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建，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均用花斑纹石铺砌，宝城之外，又有罗城，所用木石砖等建筑材料，均有严格标准，巨石包括青石、白石、花岗岩、汉白玉四种，大部分采自房山大石窝，小的几吨，大的几十吨，甚至上百吨，总计不下几十万块。木材楠木采自湖广、云贵和四川。最粗的直径在 1.4 米以上。且不说采集有多难，仅就运输而言，运一块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巨石到工地，需用民夫 2 万人，用时 28 天，耗银 11 万两。仅四川一地，为之采木而丧生的不下 10 万人。整个工程下来，耗银 800 万两，相当于国家田赋两

年的收入。开工4年，因财力枯竭，不得不暂停。为筹集经费，谕令工部滥铸钱币，规定每月铸铜钱200万枚送到工所，要求百官捐助工银。遭到拒绝后，下令开纳事例，即所谓买官，将官职明码标价出售，凡是有钱人家，不论出身、资历、学历如何，只要肯出钱，就可以买到相应的官职。

昏庸的明神宗在位48年后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仅一个月，竟莫名其妙地因医疗事故而离开了人世。光宗死后，他15岁的长子朱由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登极称帝，是为明熹宗。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样迷恋金钱，可也无心于国事。他喜爱木工，一天到晚将精力全都用在设计制造木器上。历史记载说：“熹宗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术，运斤成风。施設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在木工设计制作上，他是那样的执著，那样的认真，每当造作有所成就时，他得意忘形，忘掉膳饮，是寒是暑没有感觉。而他不是木器设计师，也不是能工巧匠，而是君临天下的君王。

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铍凿之中，这就给宦官权奸魏忠贤的窃权开了方便之门。魏忠贤本是一无赖少年，整天鬼混在赌场上，

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自阉入宫，在宫中以结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飞黄腾达。熹宗当上皇帝后，对这位乳母恭敬关心有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都当上了锦衣卫千户，成了皇帝身边的要人。魏忠贤本不识字，因客氏的关系竟被委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客氏其人淫而狠毒。魏忠贤斗大字不识，但其人也非平庸之辈，记载说他“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的记忆力好，阴毒，善于奉迎，成为他的资本和看家本领。而他正是借助自己的个性特点，见风使舵，与客氏联手，一唱一和，逐渐取得了熹宗的信任。他利用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每当熹宗制作在兴头上的时候，前去奏事，熹宗不愿受到干扰，往往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这样，就等于把处理国事的大权，交给了魏忠贤。

魏忠贤的这种行径，自然引起朝中正直士人的不满，抨击客氏和魏忠贤的，也不乏其人。只是由于朝廷的袒护，都没有结果。他为了巩固和扩大已经到手的权力，交结朋党，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宦官有王体乾、李栩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褒、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他与学士顾秉谦等人勾结，狼狽

为奸，把持朝政，陷害忠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又捏造罪名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将他们严刑拷打致其惨死于狱中。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甘当他的爪牙义子亦不以为耻，并且到处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瞻仰祭拜。这样就使朝政更加败坏。多亏时间不算太长，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仅23岁。熹宗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人们又称他为崇祯帝。

6

崇祯帝17岁登极，对于现状也颇有感慨，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后，他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起用干练人才，在辽东为抵御后金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他勤于政务，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也颇令人感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的。

内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朝廷的治国安邦是通过系统权力实施的。官吏是朝廷政令的实施者。德才兼备历来是官吏选任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朝廷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明朝末年，政治败坏，用

崇祯年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话来说：“邪人当路，贿赂公行，几于不成世界。”社会评价观念出现扭曲变化，官吏催科严者为卓异，督责严者为循良。官吏的选拔任用以金钱之多寡为归宿。权钱交易渗透在官吏选拔任用的每一个环节。人们把入仕为官作为谋利的手段。时人钱帑曾说：“进人不必忠良，誉人必张朋党。政以贿成，爵以贿买。”身为辅臣的周延儒利用职权，大开贿赂之门，买官卖官发展成为名码标价。一位监司用5000两银子贿买个边抚，后来担心钱少，又增加了2000两，结果果然如愿以偿。又有一个部郎官，想谋得个浙海道，人们说得花五千两银子，也有说用不了这么多，只要3000两就可以了。于是他先交上一半，结果弄了个府官。比如，在礼部谋得个办事员曹官须花2000两，若是兵部衙门的曹官则须花上3000两银子。馆选也为金钱所左右。正卷副卷的成绩评定，不是以内容优劣为准绳，而是以银数之多寡为低昂。因此，每遇新科馆选之日，京城金银行业的生意就火爆起来。崇祯帝曾对内臣说：新进士馆选，将城内金子都换尽了。买官成为一种投资。一旦买来个官职，就必然地要将支付出去的资金捞回，而且要成十倍百倍的捞回。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召对时曾对文官爱钱之风的形成与膨胀有过陈述。他说：“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闻一个督抚，非五六千金不可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因此，行贿受贿，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贿赂的规格也日益提高，先是送白银，

继之送黄金，再送是珍珠。政治败坏使得朝廷政令废弛，成为具文，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来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他们布满州县，为所欲为，天下岂能长治而久安？

军事系统败坏，军心思变。明代军队管理制度完善。京营与地方部队都有固定的编制。凡是死亡逃跑以及年老退役造成的缺员，都要依照规定及时予以增补，军饷按在册人员如数发给，这是保持军队稳定、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措施。明朝末年政权败坏，导致军政败坏，武官选授与升迁不是依据本人的军事才能，而是依据行贿钱数的多寡，将领不以领兵练兵提高军兵的战斗力为己任，而是在肥大自己腰包上打主意。明末无论是京营军兵，还是边兵，逃亡极为普遍。崇祯十五年（1642年）孙承泽曾说：“近来逃亡缺伍，不知其数。”由于军饷是按照在册人数发放的，各地将官无不在空额上打主意，员缺不予增补，军队被吃空额、挂名、老弱充数掏空。明总兵吴襄曾说，关宁兵在册为8万人，实际上只有3万人，真正能够用来打仗的只有3000人。京营是国家军队的主力，是守卫京师的主要力量。按照核实在册的京营人数不下十余万，实际上登城守御的军兵不到5万人，也就是说半数都是虚额，而其中能够用来作战的战兵，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了。另外，军兵生活没有基本保证。军兵生活靠的是军饷。明末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军饷供给，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到天启七年（1627年），延绥欠饷1154148两，宁夏欠饷210790两，甘肃欠饷752555两，固原欠饷327725两，四镇共欠2445219两。临巩的边饷缺至五六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缺饷已达36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军饷下发，雁过拔毛，武官到京请拨军饷，有三成的回扣。就是说请拨饷银一万两，就要扣下3000两给办事衙门或官员。领回下发，将领们暗箱操作，层层克扣，有禁不止，正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德所说：“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且乐其逃，而利其饷。武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谋转升，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于约束，而用以扣饷；厚饷不用以养兵，而用以营升。伍虚则无人，又安言练？饷糜则愈缺，而安望其裕？而此两穷之道也。”因而，士兵缺饷成为严重而又普遍的问题。有的缺饷几个月、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领不到军饷。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暴涨的情况下，士兵无饷供给，无法继续生存，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时说：“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少鞋袜者，有无裤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从典衣卖箭到鬻子卖孙，从沿街乞食讨饭至离开军营潜逃，从发牢骚倾泻不满到铤而走险，举行兵变，砍死砍伤上司，烧毁官府的衙署和房舍之事，接连不断。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辽东宁远兵缺饷哗变，捉拿巡抚辽东毕自肃和宁远总兵朱梅，捶击交下，毕自肃自杀身亡。二年（1629年）三月，

蓟州（今河北蓟县）军卒哗变，围攻巡抚王应豸。三年（1630年）正月，甘肃勤王兵在安定举行兵变，杀死参将孙怀忠。四年（1631年）十一月，援辽兵在吴桥以缺饷哗变。七年（1634年），西宁军卒哗变，兵备孔闻都自杀。八年（1635年），樊城军卒哗变，放火烧死了总兵邓汜。九年（1636年），宁夏兵哗变，杀死巡抚王揖。十四年（1641年）正月，总兵王绍禹部在洛阳哗变，迎农民军入城。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安庆军卒哗变，杀死都指挥徐良宽。十七年（1644年）正月，昌平兵变，焚劫官府。兵变从边防到内地，再到京畿，表明军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军心思变，军队已乱。

10 人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也因战争规模持续扩大，军费空前急剧增长而无法补救。有统计材料揭示，明代兵饷，正统年间仅有数万，万历时增为300万，崇祯初年已达2000余万。据崇祯二年（1629年）边镇钱粮数目所载，延绥镇原额饷银10万两，今现支又增至433700余两；宁夏镇原额饷银4万两，今现支又增至133700余两；甘肃镇原额饷银6万两，今现支又增至197500余两；固原镇原额饷银48870万两，今现支又增至145823余两。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驱使明王朝在田赋征收上打主意。那就是用不断增加征收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财政上的亏空。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征军饷，每亩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第三年复加2厘，前后三次，共9厘，增征田赋52万两，成为固定的税额。可是到了

崇祯三年（1630年），9厘之外再加3厘，每亩一分二厘，共计685万余两，统称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增征田赋248万两，称为剿饷。十二年（1639年），又加征730万余两，称为练饷。辽饷、剿饷、练饷，合起来叫“三饷”，每年定额至2000余万两。如此加派，百姓何以承受？不仅如此，还有临时索取的杂征，杂征之外有加派。辅臣蒋德璟曾说：今既有旧饷，复增新饷练饷，括尽民间金钱，已不堪命。在北直、河南、山东召买米豆90余万两，而民间当费数百万之多，加上一切车辆骡驴及衙役杂费，赔累困苦，不堪言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派之害，莫若召买。”兵部尚书梁廷栋也说：“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覲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田赋一增再增，使得农民难以承受，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向外逃亡，土地因无人耕作而荒芜。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田赋的征收，无不采用高压政策，进行逼取，还将逃户的税额分摊给没有逃亡的人户完纳。在陕西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里只有一二户，势必令一二户而赔一里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在山东，十分之民，即去其八九，则以一二分之人，纳十分之差徭；十分之地，既荒其八九，则以一二分之地，纳十分之粮税。虽必不能完，然追呼捶楚，固以十分求之矣。

工商业税的征收也是同样。明神宗在位时，就开始加重这方面的征收。山东临清，万历十一年（1583年）前，商税定额为二三万两，之后，一增再增，30年间，增加了五至七倍。北京崇文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商税税银1.4万两，天启元年（1621年）改为8.4万两，18年增加了六倍。征税范围也日渐扩大，凡是进入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包括米盐鸡豕在内，无一物不税。稍有违抗，即视为抗税行为，即被扭送官府治罪，轻则罚付银两，或没收其经营货物，甚至遭到严刑拷打，性命难保。崇祯即位后，先是关税每两增加一钱，三年（1630年）再增加为二钱，八年（1635年），加征房捐（间架税），九年（1636年），又增商税税额，十三年（1640年），加征关税20万两，商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由于军需需要，取办于所经历地方，名曰借办，官府对城镇商民进行逼取，致使“城市空虚，了遗尽绝”。

税收名目繁多，正项之外有加派，加派中又有中央加派、地方加派，还有私派，究竟有多少名目，很难细说清楚。非但因地而异，又因人而异，税出多门，没完没了。有材料记载，此时山东禹城各种征收项目多达26种。户部征收的有夏税、秋粮、马草、盐钞、民兵、九厘宗禄、花绒、铺垫。礼部征收的有光禄寺细粟米。兵部征收的有京班、皂隶、柴薪、滴珠以及太仆寺马价、种马、草料。工部征收的有收料价、砖料、木柴、苧麻、胖衣、柴夫各色银两。除此之外，还有狐狸皮、角弓、